

■ 阿拉宁波话

“田”里的旧时光

赵淑萍

曾经，田地是一户人家乃至整个村庄的命脉。农忙时的焦灼，农闲时的守望，颗粒归仓时的踏实，所有悲欢的注脚都写在田里。日子就这样在四季里轮回，像一首古老的歌谣，唱了一遍又一遍。

宁波的农谚，很多带着“田”字，或者和稻作有关。“三百六十行，种田第一行”“农村田为本，种田勿落空”，这是一种朴素的生存哲学——只要把田种好养好，就什么都有了。封建社会讲究男尊女卑，生儿子、买田、买屋这三件事是头等大事。关于买田，宁波人有自己的讲究，“儿子要亲生，田要买东乡”。东乡的田有东钱湖灌溉，岁丰年稔。至于西乡，广德湖被填之后，一下雨就成灾，买那里的田，一不小心就种田种到“白龙王庙何家”（宁波老话，白白种的意思）。还有更细致的讲究，“田要买整畈，屋要买四散”。整块田便于管理，这很好理解。而屋子要四散，是咋回事呢？实则是出于防火的考虑——以前都是木结构房子，烧起来可不管你是豪宅还是茅屋，所以分散布局，尽量控制风险、损失。

农民之间的攀比也很有意思，“要搭人家比种田，莫搭人家比过年”。比田种得好坏，那是真本事；比过年谁更铺张，那是打肿脸充胖子。

那时候，人们的终极理想是什么呢？“住朝南屋，吃湖白谷”。朝南屋光照、温度适宜，能吸纳更多的阳气。湖白谷产自茼湖，水质洁白，煮出来的糯米饭软糯可口，堪称当时的“有机食品”。有这两样，人生便圆满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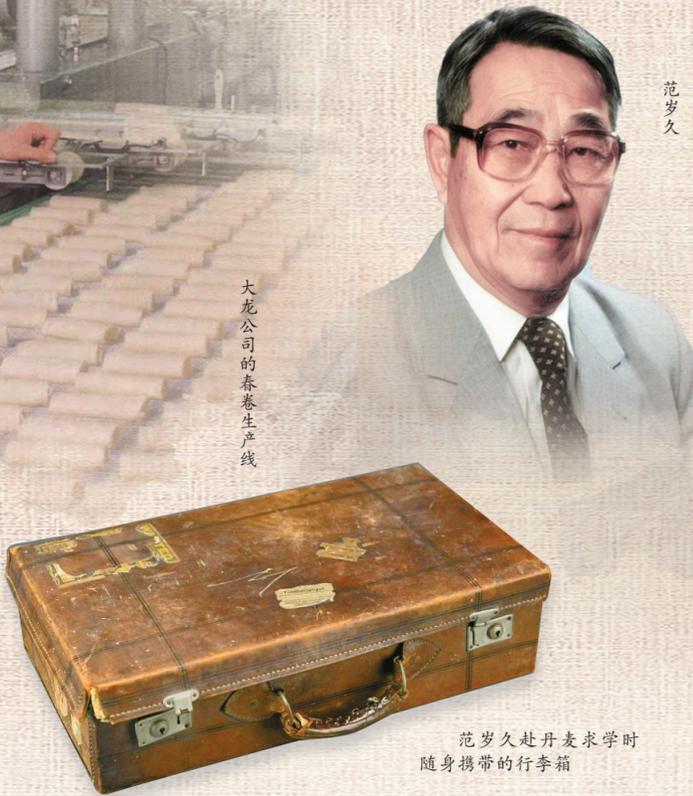
当然，种田是艰辛的，“白米饭好吃，五谷田难种”，这话听着像是一种感慨，实则是血泪教训。还有更严厉的警告，“田荒穷一年，山荒穷一生”，意谓必须勤勉。若播种错过季节，田荒了，一年会没收成；而山要是荒了，便没那么容易翻身。种树成林需十年，等你东山再起，怕是头发都白了。

节气与气候，对种田人来说，是关乎一年生计的大事。农谚有云：“黄牛叫耕田，鄞江桥开店。”意思是说当春回大地，黄牛开始兴奋地叫唤，便意味着犁铧入土、春耕开启的时刻到了。而鄞江桥曾是商贾云集的繁华之地，每逢三月三、六月六、十月十的庙会，更是开店设摊的好时机。一边是农耕，一边是商贸，黄牛与庙会，一农一商，足见古人早已懂得产业链的相互呼应。“清明出田”，说的是早稻秧苗必须在清明节前后三天内播入秧田。这个时间节点一旦错过，就可能影响一年的收成。而清明当天的风向，也被视为丰歉的先兆，“清明南风稻苗壮，清明北风禾苗黄”。若是清明天气晴好，则利于早稻生长——“清明天晴早稻好”；若是谷雨日降雨，则预示谷子颗粒饱满——“谷雨落雨谷子壮”。更有趣的是四月初八的天气，“四月初八晴，旱地种水稻；四月初八落，水田能晒谷”。意思是说，若这天天晴，旱地也能种上水稻；若这天下雨，即便是水田也能晒谷子。听起来近乎矛盾，实则蕴含着对雨水分布与作物适应性的深刻观察。这些看似朴素的农谚，其实是祖辈在泥土里摸索出来的生存智慧。

最生动的莫过于“人在屋里热得叫，稻在田里开口笑”这一句。三伏天气，人在屋里热得到处叫闹，水稻却在田里“开口笑”——原来水稻喜欢水和温热，越热越欢实。这和另一句老话“六月盖被，有谷嘍米”形成鲜明对比。

农谚里还藏着美食密码。“立夏种田金团吃，养蚕小满上山急”，吃了种田金团，便要下田干活；小满时节，蚕宝宝即将成熟，须得上簇。蚕衣要在蚕室里用竹木、芦帘和草荐搭起棚架，俗称“山棚”，因而上簇又称“上山”。金团是宁波特产，寿诞庆典、婚丧嫁娶、乔迁祭礼乃至农作时节，都离不开这道美食，衍生出子孙金团、种田金团、割稻金团、龙凤金团、五代金团、上梁金团、寿金团等。

如今的农村，正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上。田野依旧，那片田野，但它的命运已被重新书写。老一辈的农事经验、节气智慧，在年轻人眼中日渐陌生，他们更熟悉的还是手机里的天气预报App，而不是黄牛什么时候叫、稻谷什么时候“笑”。气候也在悄然发生变化，四季分明、温和湿润已是过去式，夏天变得更长、更烈，有人开玩笑说宁波是“直接从夏天进入冬天”。那些依赖特定节气和气候的农谚，是否还管用？恐怕连最有经验的农人也不知所措了。而那些农谚，就成了承载浙东农耕文化、劳作经验和乡土情感的“活化石”。

从宁波走出的华人实业家——
丹麦「春卷大王」范岁久范岁久赴丹麦求学时
随身携带的行李箱

大龙公司的春卷生产线

■ 家国天下 与时偕行

丁悠初 黄银凤

在丹麦，提起“春卷”，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一个中国人的名字——范岁久。这位被誉为丹麦“春卷大王”的宁波籍实业家，用一只只小小的春卷，在遥远的北欧创造了属于中国人的商业传奇。

负重远行 农业救国理想启航

1912年，范岁久出生于杭州，祖籍宁波慈溪。他的伯高祖是清代著名诗人袁枚，家族世代重视教育。幼年的范岁久在杭州跟随私塾先生攻读四书五经，这段蒙学经历为他日后在异国他乡坚守中国文化奠定了深厚根基。

其父袁仲符是当时上海工商界的精英，参与选举市政代表，认同新的教育原则，具有一般人所不具备的远见卓识。他期盼中国能够富强，并将这种期待寄托在儿子范岁久身上。

1935年3月，春寒料峭，23岁的范岁久只身登上火车，横穿

亚欧大陆，前往遥远的北欧。他在后来发表的《阿斯塔夫书1936/37》中写道：“丹麦以出色的农业为世人所知……中国百分之八十到八十五的人口以农为主，农民阶级是中国社会里意义最重大的阶级。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改善中国农民的日常生活条件，由此才能振兴国家。”这便是他远赴重洋的初心——学习先进的农业科学，学成回国后，实现范家“农业救国”的理想。

初到丹麦，范岁久先后进入国际民校、小农学校学习语言和基础课程。1938年，他考入丹麦

皇家兽医及农业学院（今哥本哈根大学生命科学学院）。1940年，他以优异成绩获得农学硕士学位。之后在丹麦国家植物培植实验室和丹麦国家土地发展局工作，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。1943年，积极进取的他再次进入农业大学深造，攻读博士学位。

1945年，范岁久提交了题为《稻米植物的遗传条件和细胞学的研究现状综述》的博士论文，成为最早在丹麦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之一。也是在这一年，他与丹麦姑娘阿格尼丝·伊丽莎白经过两年交往后，正式步入了婚姻的殿堂。

落地生根 大龙春卷香飘北欧

等替代传统的猪肉芥菜。没想到试销后大受欢迎，销量从每天100只迅速增长到500只。同年，他创立了“范氏工厂”，专门生产春卷。

1964年，工厂迁至韦斯特伯，并更名为“大龙食品公司”。“大龙”二字饱含着这位“龙的传人”对祖国的无限眷恋。作为科学家出身的企业家，范岁久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：他发明了“鼓风式自动包春卷机”，在13个国家申请了专利；他改进了冷冻技术，使春卷保鲜期大大延长，为大规模销售铺平了道路。

1970年，大龙公司在尼堡建成现代化工厂，装备了8条生产线，生产规模与日俱增，日产量从1970年的5万只跃升至1980年的25万只。1981年，英国分厂投入运营。1985年，大龙公司制作

了一只长达25米的春卷，皮的厚薄与普通春卷无异，被敲锣打鼓抬到尼堡市政府门前款待来宾。这一创举被载入1986年版《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》，范岁久也因此获得了“春卷大王”的美誉。

范岁久始终恪守“诚信为本，义中求利”的传统。他曾说：“我是个科学家，不懂生意经，我用科学的眼光和方法从事生产，不投机、不取巧，脚踏实地，勤勤恳恳。”他反复告诫员工：“不能随意涨价，哪怕市场上非常短缺，也不能为图眼前利益而提高一分一毫。用户是敏感的，他们的反感足以毁掉一个企业。”这种经营理念使大龙公司蒸蒸日上，产品70%外销，成为丹麦创汇大户。1986年，丹麦女王的丈夫亨利克亲王亲自为他颁发“菲德烈国王九世出口奖”。

情系故土 赤子丹心回报家乡

1972年，阔别祖国37年后，范岁久终于第一次踏上回乡之路。此时，父母均已告别人世，好在与弟弟、表妹等亲人的相聚，令这位游子感到了深深的幸福。此后，他十多次携家人回国探亲、扫墓，并多次应邀参加国庆庆典。

1982年，范岁久创立“大龙基金会”（2003年更名为“范岁久基金会”），专门资助中国留学生和赴丹交流团体。他的家常常成为留学生的临时居所，他慷慨提供食宿，却从不求回报。2000年，他向浙江大学捐赠160万丹麦克朗，建

立“范岁久医学图像实验室”，支持学科建设。

范岁久的爱国情怀深深影响着后代。他为两个儿子取名“本德”“汉民”，寓意眷恋祖国，永不忘本。小儿子范汉民1989年加入父亲的事业，1992年正式接管大龙公司。他继承父志，积极推动中丹文化交流，2012年向设有孔子课堂的哥本哈根尼尔斯中学捐款10万丹麦克朗。2006年前后，当一批中国文物非法流失到哥本哈根时，范汉民主动斡旋，协助中国驻丹麦大使馆与丹麦警方将文物追回。2008年范汉

民获文化部表彰。

2003年2月，范岁久与世长辞，享年90岁。作为欧洲老一辈宁波商人的杰出代表，范岁久先生的强国梦想、赤子情怀、开拓精神和务实诚信美德，受到旅丹华人与家乡人民的敬仰。他的老同学波尔·汉森曾感叹：“范岁久的一生，创造了一个连安徒生也写不出来的童话！”

从东海之滨到北欧国度，范岁久用一生诠释了什么是“龙的传人”——无论身在何方，心中那份对故土的眷恋与担当，永不消逝。

■ 说马

马镫并非寻常物

桑金伟 文/摄

年轻时去新疆禾木采风，背了个大摄影包，走得实在太累了，欲找马骑，正好看到有个小男孩牵着马“寻租”。这是我首次踩马镫上马，马镫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关于马镫，最简单的定义是挂在马鞍两边的“脚踏”。马镫一般垂在马的两侧（偶尔也有只挂在骑手上马一侧的单只马镫），被置于马鞍之下，故不易引起注意，有人仅把它当作马鞍的一部分。镫是一个平底的环形物，用皮带等物固定，因其经常配在马上，故名“马镫”。

马镫的直接作用，在我看来至少有三：一是帮助上马的用具，是骑手上马时踏脚用力的地方，使得上下马更便捷；二是有利于维持骑行平衡；三是夹紧马腹的用具，骑手要加快跑动的速度，双腿须紧紧夹住马腹。马镫多是金属制成的，通过马镫施压马的腹部时，马会感到疼痛，从而得知骑手人要加速的意图。这样骑手人就不用扬鞭了，解放了双手。

然而，马镫不是全然没有缺点的，新手下马时要做好快速脱镫动作，不然容易被马拖行。但据我个人的实践经验，掌握脱镫技巧并不难。

马镫通常不大，但其发展到后来，花式也不少。最普通的是铁制的，考究点的铜做的，甚至还有鎏金和雕花。马镫的形状一般是“上圆下平”。我想，“上圆”是为了悬挂，“下平”是为了更好踩踏。我也看到过中国早期陶马上的三角形马镫，但究竟是制作陶马时为了方便把马镫捏成三角形，还是真实马镫原本就有三角形的？不得而知。

不久前，我在《光明日报》上看到杨建民发表的《沈从文说马镫》一文，作者写道：“沈从文认为，中国人骑马始于晚周，最先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开始。而马鞍具之类发展仍有一个过程。那么马镫出现于何时呢？20世纪50年代中期，沈从文做了一个推测：‘马镫至晚在西汉中叶已经应用。’”沈从文认为，“据仅见一楚（国）式（样）镜上骑乘而言，骑手脚微曲，而附近有一饰物，似已发明了镫。以战国时大量使用骑兵需要，踏脚马镫早有发明，不足为奇”。

马镫的发明，意义非凡。马镫，又被西方马文化研究者称为“中国靴子”。有了它，骑兵可以更轻松地做各种动作，人类战争史迎来了骑兵无敌的时代。“马镫的应用，创始于中国，对于世界有极大贡献”，这是沈从文在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中提出的观点，说明马镫并非寻常物。



铁制马镫



精致的铜马镫



马镫“上圆下平”（石刻作品）



骑手踩镫上马